



臺灣文獻蒐集的過去與現在

百城堂書店

林 漢 章

在臺灣研究被極度渲染、炒作成一門顯學的時代，不少其他研究領域的學者也轉而開始研究臺灣史，學術單位或公家機構也開始大量蒐購臺灣史料，而民間文史工作者也一窩蜂的成立文史工作室，企圖搶食這一塊文化大餅。這其中，公家機構則比較名正言順的是在保存文化資產，文史工作者與及部分學者則大多在搶食各公家機構的經濟資源，瓜分文化預算。

如果在二、三十年前，臺灣研究則是一門較具敏感性的學問，尤其臺灣兩字更是如主政者眼中之刺，因為有其政治性的考量、臺灣兩字幾乎等於臺獨。當年先輩周憲文先生的《臺灣經濟史》一書，原本是要給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（現國史館臺灣文獻館）出版，據說當時省文獻給的修改意見書就多達百頁，而必須修改的則大都是政治性的字眼，如臺灣兩字也須改成本省或本島等等，其後周先生憤而將書稿取回，轉給民間出版社印行。不過以當年政治環境而言，亦無可厚非，官派學術單位當然得考量來自高層的壓力，經過這十多年來的開放研究，或許研究工作亦可得到些許解放的補償吧！

要作臺灣文獻資料的蒐集，首先必須瞭解「臺灣文獻」這四個字的演變過程，他不是代表臺灣省文獻會的同名刊物，而是臺灣文獻蒐藏家們對臺灣資料的稱謂，在較早時期（二、三十年前），臺灣文獻是泛指臺灣本籍或流寓臺灣，以及仕宦臺灣的文仕官吏之書畫作品，這還不包括這十多年來炒作上來的西洋畫，而臺灣文獻在蒐藏家口中被簡稱

為「文獻」。故而當時蒐藏家與古董商口中稱謂的「文獻」就是單指傳統書畫而已。不包括其他古書、寫真、契約文書等，而現在通稱的「古文書」在當時只簡單的直呼「地契」或「契約書」，這因為古文書中絕大多數是土地買賣及相關契約，所以地契兩字是非常貼切的稱呼。如是要叫作「古文書」的話，勢必要把範圍擴大到所有書面資料，近年來大多數學術單位、公家機構出版品也都直稱「古文書」，但其實也跳脫不了契約書的範圍。

最近這幾年古董販子與蒐藏家口中比較常用的名詞是「文獻資料」、（也簡稱「文獻」）「紙類」，這是泛指所有與臺灣研究有關的紙張類收藏品，其範圍大到官文書（奏章、公文、佈告等），小至民間征稅的單據等，幾乎無所不包，只要是紙張類寫本、印刷品都算數。故而臺灣史在中國史中雖然只是一個小點，然而就臺灣史本身而言，卻是延展到無限大。這不是臺灣史研究者的自我膨脹，而是臺灣史研究已經快到極限。

很多人都以為蒐集臺灣史料只要到牯嶺街、光華商場舊書攤就可以如願，其實抱持這種想法的人大多會很失望，因為在舊書攤要買到臺灣史資料的機會幾乎非常渺茫，現在做臺灣史資料買賣的反而以古董商以及跳蚤市場為多，這個變化與臺灣社會經濟成長息息相關，在早年臺灣民間經濟比較艱苦的年代，舊書、紙張類東西都是當作廢紙，論斤賣給收破爛的小販，這些小販有些則直接載到牯嶺街的舊書攤去販賣（自己有擺



攤)，有些則是賣給「販頭間」（回收站）——舊書業者再去挑選回去零售。這種生意方式在民國62年間，臺北市政府爲了整頓市容，將牯嶺街舊書攤遷入光華商場以後，生態上又起了很大變化，因爲有較穩定的攤位，業者大多只做舊書買賣而不再收破爛，而來源則同樣是回收站，另外有部分是家庭叫去收購。這時期因光華商場二樓進駐了大批古董、古民藝店，商人因有利可圖，也大多兼營古書。古董販子因多數是挨家挨戶收購古物，而且是無所不收的情況下，其範圍與質量自然較舊書店豐富（因有些好一點的古書或資料、地契，一般人家不會當廢紙處理，而古董販子收購價又較高），故而在舊書店很難碰到的古書、地契等文獻資料，在古董店就顯得相當多量。這之後很多蒐藏家都曉得蒐集臺灣史料的竅門，就是多逛古董民藝店。

然而，好景不常，臺灣經濟起飛後，各城市大多汰舊換新的拆老屋蓋新樓，以致貨源越來越短缺，故而不得不向外發展，所以在大陸政策開放之前，有部分腦筋動得快的古董商就搶先登陸香港、大陸兩地，雖然身入虎穴極端危險，但爲了生存也不得不放手一搏。不過還好的是運回了不少臺灣所缺的清朝臺灣史料，這其中有些戰圖、奏摺、古書、地圖、書畫等等不一而足。大陸的臺灣史料在經過數年的大量蒐購之下，也漸漸很難入手。在一切向錢看的原則下，商人的腦筋總是特別靈光，日本人既然統治臺灣五十年，日本一定有很多臺灣史料，雖然光復時遣送返日的日本人只能帶簡單行李，但之前的五十年間，一定有相當多的臺灣史料被帶回去。所以，臺灣的古書、古董商就開始轉向日本，到日本的古書店、古董店乃至跳蚤市場，去蒐尋臺灣的任何相關文物、古書，在這時期臺灣由日本回流文史資料、圖書文物，大宗的以日文臺灣史古書、臺灣風景

明信片、古寫真、古地圖等爲生，偶而也可碰到日本人蒐藏的臺灣古契約書，日本在臺灣官吏的檔案，臺灣文人的書畫作品。因爲這十多年來日本經濟景氣低迷，故而給臺灣商人有很大的機會與空間，此時，日本藏家與研究者則較屬劣勢。

老的文史資料，只會逐漸絕跡而不會增長。在日本、臺灣史資料也在逐漸減少，尤以近一年來，幾乎越來越不容易找尋，這不單是臺灣人的感慨，就連日本商人都這麼認爲。這其中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，因爲臺灣藏家對史料文物需求量較大，也比較敢花錢，日本藏家在日本反而比較買不到所需資料，因爲日本商人大多會把這些資料留給臺灣同行，所以有些做臺灣研究的日本學者，寒暑假都會跑到臺灣來找資料，然後又把資料買回日本。筆者即曾見到一位大阪工業大學的老教授，將一套重22公斤，剛從大阪寄到臺灣不到三天的套書，又買回大阪去，還直說這套書在日本都很不容易找到，其興舊之情，直溢言表。

在臺灣要蒐集臺灣文獻資料，近年來也是愈見稀少，尤其在九二一之後，幾乎是貨斷其流了，沒有老房子，就不會有老資料，這種現象影響最大的是古董市場和跳蚤市場的業者，有許多做臺灣民藝的古董店，生意幾乎是半停頓，而跳蚤市場以前人山人海的盛況也不再有了，大多因收不到貨，而讓顧客流失掉，往後，這種情況可能會更加嚴重，因爲隨著各縣市博物館、文化局的設立後，即開始大量蒐藏臺灣本土文物，這種「只進不出」的採購，會影響到文物市場的流通。如果是個人蒐購，將來總會有玩膩的時候，到時又會流向市場，最近即有數個例子，也有藏家自個開店販賣藏品，如此才能貨暢其流，互通有無。而文化局、博物館在購藏上也會愈形困難，除向藏家收購外，以後在市場上可能很難買到所需文物史料。